

[开卷有益]

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

——读余华的长篇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

白石虎

鲁迅先生在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一文中认为: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我以为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评价文学作品。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在细雨中呼喊》都是悲剧价值的实践探索和成功范本。

以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为例,看余华先生是如何一步步展现人生悲剧的。

小说甫一开始“1965年的时候,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。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,当时我已经睡了,我是那么的小巧,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。屋檐滴水所显示的,是寂静的存在,我的逐渐入睡,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”但忘不了的是——在这时候“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……”一个六岁的孩子经历了细雨的黑夜,开始了一幕幕漫长的记忆,诉说着一度“蛮荒”时期,有价值的东西渐渐地毁灭,至今读来,仍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小说以主人公孙光林的祖父之死——“死人躺在蜘蛛网的下面,我看到了他,就是昨天傍晚向我走来的黑衣男人。”作为悲剧的序幕展开,以至于“我远离南门之后,作为故乡的南门一直无法令我感到亲切。”

悲剧还在继续。在“婚礼”一节中,“我坐在池塘旁的那些岁月,冯玉青在村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走动,曾给过我连续不断的憧憬。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就是这样一个青春美丽的村姑,在失去贞洁之后,还要天天面对嘲笑和辱骂,没有人理解她、同情她,最后只得忍辱受气随走村串户的货郎在南门消失了。

在“死去”一节中,写了主人公的兄弟之情——“我的弟弟,从哥哥脸上学会了骄傲的孙光明,在那个夏日中午走向河边去摸螺蛳。”孙光明是为了救别人家孩子才淹死的。父亲为了给儿子争取补助,被穿警服的人带走了。“母亲是这年春节来临前死去的,那个冬天的晚上她吐血不止。”而父亲的死更是惨

不忍睹——“孙广才是由他无限热爱的酒带人坟墓的。”“翌日清晨被人发现时,他俯身漂浮在粪水之上,身上爬满了白色的小虫。”主人公一家的悲剧达到了极点。

在“出生”一节中,主人公孙光林回忆起自己苦难生命的开始——“我出生时,正值父亲孙广才因为饥饿难忍在稻田大发雷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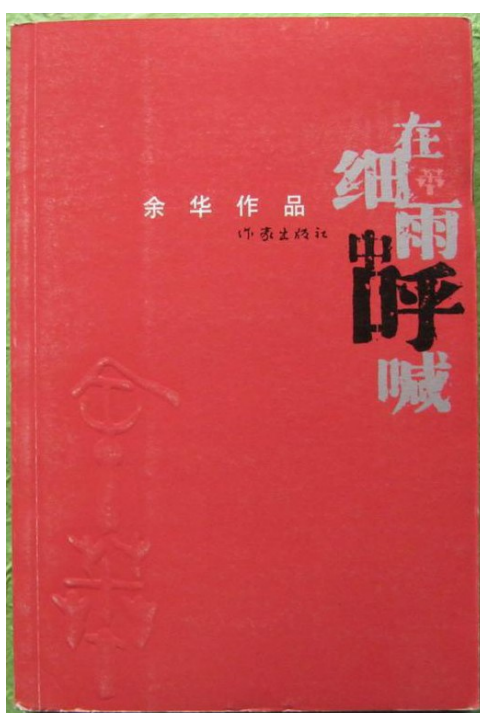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友情”“战栗”两节中,孙光林在缺少家庭温暖后,和苏宇成了好朋友。然而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不安和无助——“我身体的成长始终在脸色苍白里进行着。”

在“苏宇之死”一节中,“苏宇的身体终于进入了不可阻挡的下沉……清脆悦耳地消失在空气之中。”之后,小说还深情地回忆了主人公和鲁鲁的一段友情。

在“遥远”“风烛残年”“消失”的章节中,主人公回忆起祖父和祖母。追述了孙家的历史,表达了对父亲的鄙视和对祖父、祖母以及曾祖父敬仰,他对祖父的怀念始终挥之不去——“孙有元细水长流的生命,绵绵不绝地延续着,使村里人万分惊讶。”

在“威胁”“抛弃”“诬陷”几节中,主人公在一个叫孙荡的城镇,有了国庆等一班小朋友,然而,当某一天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,不再理睬我。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,却显得力不从心。”国庆被父亲抛弃以后混入社会,在恋爱受挫时又扬言要杀人,回到学校之后,便和老师同学一起诬陷他,使主人公被关进了小屋子,受尽了委屈和折磨。

在最后一节“回到南门”中,主人公孙光林在两天时间里,经历了两桩突然而来的死去——先是刘小青的哥哥,紧接着是养父王立强,使得他的童年出现



了剧烈的抖动。养父王立强死后,养母李秀英又神秘里离开了孙荡,“我”成了孤儿,只得依靠“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,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”再次回到了南门,与小说的开头形成了强烈的呼应——“这时候雨点下来了,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……”

小说作者余华在自序中说:“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,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。”因为未来也许有不可战胜的神秘,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,恐惧哪怕是悲剧也就转化成幽默的话语和温情的记忆。

长篇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用清新厚重之笔描绘了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孤独、忧伤、绝望乃至幻灭,诠释了悲剧之美,读罢耐人寻味,荡气回肠。余华也因这部小说荣获2004年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和2005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。

[书生书事]

阅读的记忆

林华

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我就格外喜欢阅读课外书,觉得课外书有趣,有味,刺激。可是因家里生活异常艰难,每学期一块半的书、学费都是在老师反复催要的情况下分好几次才能交齐,根本不可能买课外书的。父亲的两本旧书(《水浒传》和《薛刚反唐》)我已看了多次,虽然不能全都看懂,但仍很想找其他课外书阅读。于是千方百计向同学打听,只要知道谁家书,就想尽办法借来阅读。

有一次,隔壁自然村的同学阿平说他家里有本《西游记》,我对他说:“只要借给我看,可答应你的任何条件,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。”阿平思考片刻说:“这个好说,借给你看两个星期,但你要帮我做两个星期的作业。”没想到他的条件如此简单,我当即答应了,傍晚放学时我主动叫他作作业本给我。

没想到,第二天阿平接过我递给他的作业本时,脸露难色地说:“真不好意思,我父亲说此书是‘破四旧’对象,不能公开外借的,如果书被没收掉就麻烦了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本来满心欢喜的心情如同冬日里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,顿时冷到了极点,却又无可奈何。回家后,我想起父亲与隔壁自然村好多人很熟悉的,于是央求父亲去给我借书。父亲一贯支持我读课外书,此时他虽然没有爽快答应,但也没表示反对,我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第二天傍晚,父亲将《西游记》递给我说:“只准在家里看,不准带到学校去。另外,要注意爱护书,千万别撕破了。”我慌忙点头答应,因为在这一刻,我觉得父亲最好,以前几次挨他打而对他的怨恨顿时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可是难题是,只要没下雨,在家里母亲都叫我干活的,只有晚上在昏暗的灯光阅读。

几天后,学校课外活动时,我将《西游记》中的一些故事说给几个同学听,阿平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,我装作不知,顾我说着书中的情节。同学阿详说:“看来你肯定读过西游记了,什么时候借给我看看好吗?”我正要答应他,顿觉不妥,于是撒谎说:“我哪有看过《西游记》呀,是我父亲说给我听的。”

又过了几天,傍晚放学回家路上,路边麦田里有几位农民在锄草。其中一廖姓老农对我说:“贤林,听说你会讲《西游记》里的故事,现在讲几个给我们解解闷吧。”我听后顿时来了兴致,本来很想将书中的故事分享给他人听,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于是我凭记忆讲了“大闹天宫”“孙悟空拜师战熊怪”等情节。面对一些没文化的农民,反正我讲走样了也没人知道。正当我说得兴头上,母亲在门前离我们约二百米的大路上大声训斥我说:“你这个短命鬼,人家放学都回家做事了,你却见到石头会聊天,还不赶快给我死回来,等会叫你肉痛。”我听后吓得魂飞魄散,因为母亲在气头上打起我来是不顾轻重的,与电影里国民党特务打地下党没有太大区别。所不同的是,地下党挨打是跑不掉的,而我挨一两下就撒腿逃得很快。

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我已看过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书籍了,并能大致讲一些书中的故事。有次放学路上,几个老农在生产队田里剪萝卜菜,一杨姓农民把我叫住,让我讲故事给他们听,他说随便《西游记》或《水浒》都行。我说不行的,母亲叫我放学后去采猪草。说后我有意无意地看着他剪下来的萝卜菜。杨姓农民说:“现在已傍晚了,你能采多少猪草,等下拿点萝卜菜去就行了。”他说的正合我意,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《水浒》中的几个故事。一会儿母亲又在门前道路上大声喊我了,这天有些逆风,只有“短命鬼”、“天寿鬼”听得较真切,其他说什么却听不大清楚。

没想到,刚进家门,母亲看到我抱着些萝卜菜回来,马上过来拽住我的耳朵愤怒地说:“你这个短命鬼,谁叫你到生产队田野拔萝卜菜的,老师没有教你要爱集体吗?”我马上辩解说:“是姓杨的伯伯给我的,不信你去问。”母亲放开我被拽得红红的耳朵,余怒未消地说:“我会去问的,如果骗了我,不叫你半死我名字倒过来写。”

虽然50余年过去了,但小时候喜欢阅读课外书的情形,仍使我记忆犹新。

[好书推荐]



《李安电影的生活伦理叙事研究》

作者:张玉香 著
出版社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李安电影之所以能寻得文化的融合与“平衡”,归结于李安的多重文化身份问题,这一点为许多研究者所论述。李安的“家庭”题材电影中表现出来的多种文化认同与融合,归因于李安自幼接受的教育与生活经历,最终形成其多重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。

这本书基于电影的相关理论,对李安的现代影视作品进行了分析。

作者认为,正是这融汇的文化立场,使得李安在影片中能兼顾多方观众的文化心理,由此达成多元文化的认同与融合,这也是为什么李安的电影能够走向世界。

扫一扫
在线阅读